

變化的時代語境與地方背景，相當到位地敘述和分析了川大國立化進程中各方勢力的活動和心態，比較豐實地重建了「地點」——川大複雜的國立化進程及相關問題。因此，該書是可以「為學術界研究中國現代大學的『國立化』及與之相關的民族主義、『國家建構』等問題提供一個可供進一步分析的事例，以增進我們對中國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在多層面上展開的了解」（頁3）。本研究也可以作為透視民國時期國家（中央）、社會與地方（包括社會與文化）、學校與社會、學術與政治、新與舊等

各方勢力如何博弈的「地點」個案，使我們見微知著，更好意識到在近代中國這個有「多個世界」存在的時空裏，存在着或競爭或合作或利用或互不相關的各種表達，也存在着相應的多種實踐，這些表達與實踐體現在多種多樣的場合及論域裏，如果試圖用比較單一的模式和現象、比較單一的分析維度來概括與書寫它們，無疑就會把歷史簡單化、片面化，不利於我們更深刻和多元地認識近代中國大學乃至近代中國的歷史。在筆者看來，這也是王東傑此書最重要的貢獻。

## 激蕩年代的冷眼觀察

### ● 高益民



王芸生：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  
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5）。

魯迅先生評《史記》的「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」，成了史學與文學完美結合的最高境界。其實當今史家治史，因有近代科學範式的約束，多已不得不放棄對文學性的追求；而文學戲劇家筆下的歷史題材，又難以一任史實的限制，所以寧以戲說博人之寵。倒是新聞界動用學者型記者為讀者講歷史

魯迅先生評《史記》的「史家之絕唱，無韻之離騷」，成了史學與文學完美結合的最高境界。當今史家治史多已放棄對文學性的追求；而文學戲劇家寧以戲說博人之寵。倒是新聞界動用學者型記者為讀者講歷史故事，卻為兩者的適當兼顧創造了條件。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正是王芸生講故事的產物。

1931年「九·一八」事變，舉國震驚。《大公報》總編張季鸞認為「九·一八」戰禍的原因，首先是因為中國「地大物博，自恃其不可亡」，由此國人併發健忘之症，近代以來雖屈辱種種，但「事過境遷，又復忘之」。所以張倡議開闢一個歷史教育專欄，用以明恥。他把這個為國人講歷史故事的任務交給了時年三十歲的王芸生，當時進入《大公報》不過三年的王芸生，沒想到這個專欄使他成了舉國聞名的中日問題研究專家。

故事，卻為兩者的適當兼顧創造了條件。

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(下引此書，只註卷數及頁碼)正是王芸生講故事的產物。1931年「九·一八」事變，舉國震驚。《大公報》總編張季鸞自述當時「瞻念前途，焦憂如焚」，他認為「九·一八」戰禍的原因，首先是因為中國「地大物博，自恃其不可亡」，由此國人併發健忘之症，近代以來雖屈辱種種，但「事過境遷，又復忘之」。所以張倡議開闢一個歷史教育專欄，用以明恥。他說：

救國之道，必須國民全體先真恥真奮，是則歷史之回顧，當較任何教訓為深切。因亟纂輯中日通商以後之重要史實，載諸報端，欲使讀本報者撫今追昔，慨然生救國雪恥之決心。(〈張序〉，第一卷，頁14)

張季鸞把這個為國人講歷史故事的任務交給了時年三十歲的王芸生，當時進入《大公報》不過三年而僅讀過八年私塾的王芸生，沒想到這個專欄使他成了舉國聞名的中日問題研究專家，也使他成為真正的「學者型記者」。

王芸生故事講得好，首先得益於他的史料功夫。在正式執筆之前，王芸生已經對清宮檔案進行了三個月通宵達旦的整理和研究。專欄刊出後，王芸生以其治史之謹嚴、敘事之鮮活不僅打動了讀者，更征服了政界與學術界，王本人也因此聲名鵲起。專欄的魅力，

更使社會各方人士都紛紛主動為他提供珍貴資料。1934年王芸生在廬山見到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汪精衛時(當時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已成書七卷)，汪甚至也表態說，此後編書如需要部中檔案作材料，必予便利。王芸生對中日等國外交檔案等第一手材料的大量的、比較的運用，使這部書成為中日關係研究的典範之作，乃至現在的相關研究都受到了它的影響，而直接引用其文獻資料者也不乏其例。

該專欄每日文前冠以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！國恥認明，國難可救！」的鏗鏘口號，似乎暗示文章本身也是令人蕩氣迴腸的戰鬥檄文，但卻恰恰相反。王芸生是寫政論的好手，有所謂「名世大手筆，愛國言論家」的美譽，但是在這一專欄中他慷慨激昂的宏論並不多見，更少見他重複那些流傳市井的概念化的刻板結論，多只有鑿之確確的文件抄錄，或加之對前因後果的扼要介紹，而有關的分析往往也只是寥寥數語，畫龍點睛。如清政府對日俄兩國在中國交戰竟持「局外中立」立場，直至今日也為國人所痛恨不已，但王芸生對此所論極少，只有大量的清政府對俄日兩國照會、對戰區的劃定及實施中立原則具體辦法等相關文件。王芸生非常清楚，民窮國弱的中國在近代以後所做的種種所謂艱難選擇，實際上已經毫無選擇可言。1903年，袁世凱在政府決策前曾說「附俄則日以海軍擾我東南，附日

則俄分陸軍擾我西北」，清政府只好在兩難之中做出了「日俄決裂，我當守局外」的選擇，近年也有史家論證這是當時中國唯一可能的選擇。王芸生已在大局上揭露了清政府的本質，因此並不在具體決策上妄斷是非，確有高人之處。實際上這些看似極為沉穩、表面不動聲色的文字，卻字字如血如淚，更在深處觸動着人的靈魂。可以說，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是新聞界在最激蕩的年代對中日關係所做的最冷靜的觀察。

王芸生全以史料說話，而且資料實在太過豐富，因此有人認為有堆砌之虞，而王自己亦以為本書不免粗糙。不過我們也許不應苛責這位戰火紛飛年代的報人，王芸生本來並非史學家，他早已申明：「如云作史，則不敢承。」

王芸生自有其講故事的邏輯，許多材料的選擇至今看來仍很獨到。如對日俄戰爭的講述，前後二十三節，略於兩國的軍事攻略而詳於日俄兩國的外交折衝，日俄的文件往還極細緻地揭露了兩國在東北亞角逐的戰略圖謀。有意思的是，戰爭結束後的日俄外交鬥爭和東京暴動也未被遺漏。日俄戰爭結束後，俄國雖在軍事上戰敗，但在外交上依然十分強硬，堅決不賠款。樸資茅斯談判中，日本代表小村壽太郎對沙俄代表威特(Sergei Y. Witte)說：「聽君之談話，竟若代表戰勝者。」威特答曰：「此間並無戰勝者，因之，亦無戰敗者。」所以王芸生感慨「戰敗

國之外交，辦至如此地步，歷史上實少先例，無怪日本國民認為屈辱也。」(第四卷，頁202)繼而王芸生對《日俄和約》簽字當天發生在東京的日本群眾抗議暴動(即著名的日比谷燒打事件)進行了細緻的描寫：

七八萬群眾，各執弔旗，集於廣場之上，天空高懸「十萬碧血如何」之大字。會台上遍布「嗚呼大屈讓」，「肝膽一劍寒」，「破棄，破棄」，「吾有斬姦劍」，「死有餘辜」，「風蕭蕭兮易水寒」等標語。……約五時頃，群眾蜂擁至內相官邸，磚石紛飛，守護警察揮刀彈壓，群眾大憤，吶喊放火，內相官邸被焚，搗毀國民新聞社，以其立論袒護政府，謚為「俄探」、「賣國奴」。……(第四卷，頁209)

這段有據可徵的描寫非常準確地把握了當時日本社會的整體心態。

相比之下，著名日本史專家吳廷璆1993年的大作《日本史》對日俄戰爭的描述，卻着眼於另外一個側面並作為重要一節，即日本人民的反戰鬥爭，其中特別提到日本媒體的鬥爭。固然，日本有部分基督教人道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通過報章宣揚非戰論，與謝野晶子在日軍進攻旅順時也發表了反戰作品，但這些輿論因刊物發行量小並未成為主流，加之《萬朝報》後來也由反戰轉向主戰，更使朝野上下一片戰歌，十分可怖。日俄戰爭前的1903年9月，在日本的德國

王芸生是寫政論的好手，但是在這一專欄中他慷慨激昂的宏論並不多見。如對清政府對日俄兩國在中國交戰竟持「局外中立」立場，王芸生只在大局上揭露了清政府的本質，並不在具體決策上妄斷是非。實際上這些表面不動聲色的文字，卻字字如血如淚。可以說，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是新聞界在最激蕩的年代對中日關係所做的最冷靜的觀察。

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對於中日關係研究方法論的另一貢獻，是以世界大格局的眼光看待中日關係，這點對當今的中日關係研究仍極重要，已有業內人士指出，當今中日關係研究隊伍中缺乏可操數種語言、有多方面學術背景、接受過東西方學術訓練和有國際大格局眼光者，是難以理清紛繁交織的國際關係中的中日關係的一大問題所在。

人貝爾茲 (Erwin von Baelz) 在日記中寫道：

如《時事》和《東京時報》這樣最有名聲的新聞紙，也盡寫戰事迫如近前，只云交涉時期已然過去，須以武器代言，但卻絲毫不提即便戰勝也將伴隨何等困難之結果。

由此可見，反戰呼聲在當時已被淹沒在開戰的叫囂之中。而這也正說明王芸生對日本民眾狂熱的戰爭意識的把握，更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。

近代以來，純粹的中日關係已經不復存在，正如王芸生所作的說明：

本書雖名《中國與日本》，然自甲午戰爭以後，中日外交漸成為世界的關係，與歐美各國有不可分離之勢。如甲午以後俄國的侵略東北，德國的經營山東，均為後此對日關係的前身；及以後美國注意滿蒙問題、華盛頓會議等事，均與中日外交成直接關係，故也不能略而不述。（〈編例〉，第一卷，頁15）

所以書中有大量篇幅細緻地描述了中國與其他列強間的種種交涉，如中俄東三省交涉一章竟有四十四節之多。所以這部書對於中日關係研究方法論的另一貢獻，是以世界大格局的眼光看待中日關係，這一點對當今的中日關係研究仍極重要，已有業內人士指出，當今

中日關係研究隊伍中缺乏可操數種語言、有多方面學術背景、接受過東西方學術訓練和有國際大格局眼光者，是難以理清紛繁交織的國際關係中的中日關係的一大問題所在。

1979年對原書的修訂，使王芸生的分析帶上了一些成論的套子，那正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之中飽受精神折磨的王芸生的學習成果，讀了令人唏噓感嘆。書中對李鴻章的痛恨處處溢於言表，1979年所寫的修訂導言中，對李鴻章更有不少痛罵，現在看來未免簡單。當時列強湧入亞洲，弱國要求得生存只有利用列強均勢。中國對列強均勢利用失當，所以愈加貧弱；日本對列強均勢利用得當，所以加入了列強。但利用均勢本身並不直接意味着賣國投降。李鴻章時期的以俄制日、日俄戰爭時期中國局部暗中助日的舉動，都是想利用列強均勢而求國土得以暫時保全。加之李鴻章不過是清政府的一個代表，徒以賣國投降相罵就陷於流俗了。

《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》使王芸生一舉成名，又使他在「文革」逆境中較他人更早獲得解放，所以他在晚年燒了自己所有的日記和其他作品，卻留下了這部書。北京三聯書店在1979年決定重新出版這部開啟中日關係研究先河的著作，並趕在作者去世前兩個月讓老人看到了第一卷的面世，功德可昭。今年先生去世二十五周年之際又刊新版，以慰先生之靈，也遂了中日關係研究者們的心願。